

治雾霾,争论不如行动



今日论语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霾”才是最恰当的2013年度汉字。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从南到北走过不少城市,但不同城市的空气都带着相似的气味,这完全是雾霾天的功劳。两三年前,“雾霾”这个词还很少出现,但如今它已成为与阴晴雨雪一样寻常的气象术语。

糟糕的现实让我们的生化知识越来越渊博,也让环境治理成了当前社会的一种主流共识。但问题在于,人们对于治理环境的路径似乎仍有较大分歧。比如,此前有不少专家将汽车尾气视为制造雾霾天的罪魁祸首,但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专家日前发布研究报告则

称,导致北京地区雾霾的6个重要来源中,汽车尾气所占的比例不到4%,远远低于工业污染、燃煤、生物质燃烧等因素。

这一结论引发了如潮争论。有网友据此认为,许多城市的汽车限购、限行政策以及征收排污费的做法,都应该马上叫停;有学者则条分缕析地驳斥中科院专家的研究报告,坚称这份雾霾成因研究的成果站不住脚,有可能误导公众。

不同研究者之间充斥着各种专业术语的论战,对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都像神仙打架一样看不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饱受雾霾困扰,但不同地域的具体情况却可能千差万别。在实验室里纠结于所谓的“雾霾成因”分析,即使在学理上有研究价值,在实际的环境治

理中也可能显得过于“学院派”。

雾霾治理理论与现实的错位,生动地凸显了公共治理领域的一些典型问题。现实中有不少的研究者和决策者,在公共治理中都怀有某种脱离实际的乌托邦情结,仿佛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开谜团的线头,然后只需轻轻一拉就能精确无误地“毕其功于一役”。无论是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研究交通拥堵的成因、择校成风的成因,还是如今给雾霾难题把脉问诊,无非是想找到一把能直接拨动锁芯的钥匙。

可是,转型期中国的绝大多数问题都不像“1+1=2”那样简单,它们往往是众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且会随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侧面。如果不能意

识到这种复杂性,依然坐等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治理方案出现,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受困于观念的“雾霾”而寸步难行。正因如此,与其坐在那里争论我们需要哪把,倒不如行动起来,在实打实的探索中找到能打开门的那把钥匙。

脚踏实地的行动,永远比无谓的争论或什么都不做更值得赞赏。以此来看,不管是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控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方式降低PM2.5含量,还是北京探索人工消减雾霾技术,抑或其他城市尝试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升级,都是值得鼓励的真行动。推而广之,在交通治理、教育改革等命题上,最好也应尽快驱散观念的“雾霾”,用真正的行动和改革,来赢取看得见的改变。



新民随笔

冤有头

吴强

2013年过去,2014年来了。全世界各地都有热闹的活动,庆祝一元复始,展望美好未来。只是,这窗外恼人的雾霾,却不因为人们的辞旧迎新就乖乖挥手作别。新年的第一天在中度污染中度过;今天是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又在中度污染中开启,难免让人望气兴叹。

雾霾围城之下,平时生活中的健康准则也失效,开窗通风竟然成为一种奢望。原来想避免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健康专家谆谆叮嘱:要开窗、要通风;现在同样想避免这些不适,竟然要少开窗、少通风。睡了一夜的室内浑浊空气,在雾霾天两害相权取其轻,竟然也要“敝帚自珍”,实在令人有些啼笑皆非。一天没关系,两天能将就,时间再长,实在受不了。

节前有消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专家对北京地区PM2.5化学组成及源解析季节变化研究发现,北京PM2.5有6个重要来源,其中“二次无机气溶胶”和“工业污染”分别以26%和25%占据前两位,汽车尾气和垃圾燃烧合并占比4%垫底。尽管“二次无机气溶胶”这样的专业术语离老百姓还很远,很难一下子搞清楚,但“工业污染”是不争的事实,而汽车尾气不到4%的贡献率也让人恍然大悟,人们恐怕不必因为雾霾而对汽车谈虎色变;再有,此前所谓的中式餐饮油烟更是彻底脱帽,人们不必担心雾霾之下,炒个菜都要感觉带着些内疚了。

分析清楚成分当然未必就代表就能根治。根治更需要综合工程、长期努力,但是,搞清楚其中成分一定是迈出治理的第一步。治理雾霾,当然人人有责,需要全社会每个人的参与和贡献,但是如果忽略了雾霾的主要“元凶”,不愿意或者不诚心下力气真正创新转型、改变经济形态,那么治理工作也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中科院的这项研究,针对的是北京地区的情况,上海的雾霾有没有地方特性?同样急需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能靠想当然,不乱找替罪羊,在分析清楚成分的基础上,才能拿出实实在在有针对性的措施。

冤有头,霾有主。只有先给人们一笔清清楚楚的“雾霾账”,才可能还人们一个干干净净的蓝天白云。

新民新语

你得到太多了

马丹

昨儿元旦,出了趟远门。车子一路欢愉地奔着,道路旁是明显用机器收割过作物的稻田,偶尔也会晃过一两个背着包裹的老农。我跷着脚专心地数着钻过的那些山洞——从杭瑞高速的黄鹤山隧道起到德昌高速的德兴隧道终,共计25条。温暖的阳光渐渐令人昏昏欲睡,脑子却是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了这些隧道,山中的人们会怎样生活?

1938年前,新几内亚的巴桑阿大河谷就是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山谷,里面住着一个人口5万的“丹尼人”土著部落。《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说,当时的新几内亚像个窗口,让我们窥视过去的人类处境。丹尼人在山谷中一直过着采果子、打小鸟的土著生活,直至1938年6月的一天——那天,美国探险队的飞机嗡嗡飞过山谷,用现代文明打断了丹尼人不自知的“清修”。于是,丹尼人很快学会了做生意,开拖拉机。可随着文明“入侵”,丹尼部落经过几千年孕育和隔离产生的语言、民俗、艺术等人类原始文化多样性迅速被抹杀了。

被“抹杀”的不仅仅是丹尼人的土著文化。“大数据”概念被炒得火热,在线购买喜好是大数据,社交网络使用习惯是大数据,甚至可穿戴设备记录的个人生理指标也是大数据,和几年前相比,各种数据多得不得了,信息量更是爆炸式增长。可谁知,这么炙手可热的“数据”也在流失。前几天,科学美国人博客说:那些被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来的观测数据正在以一种可观的速率遗失,当研究者向1991年到2011年间发表的500项研究的相关作者索取研究原始数据时发现,在研究发表的20年后,80%的原始数据都难以获取了。科学家需要借助之前工作的事实和图表支持自己的分析或核实较早的工作依旧成立,而这种信息遗失会阻碍正在进行的实验。

所以我猜想,一切算不算“得到太多”的错,就像人们如果只会使用石斧,说不定就不会过于疯狂地开山伐木,让隧道两旁的山丘露出癞痢“脑袋”。可惜,隧道还是打通了,丹尼人最终也学会了开拖拉机。但尽管如此,人们有时候还是得想想如何让那些好的过去在“过多的得到里复活”,一如那被雾霾藏起来的蓝天。

乐见更多“为官不易”的感慨

日报观点

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等中央部门至少出台了14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规定。禁令频频之下,一些官员感叹“为官不易”;而相应的公务消费行业和市场也受到冲击、遭遇寒冬。

反腐高压态势下,官员感叹“为官不易”,应该说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它说明一系列禁令真正产生了效力,反腐反到了一些官员的“痛处”,这未尝不是对反腐

效果最有力的反证。但正如网友所言,应该纠正的认知误区是,“不是公务员不好当了,是贪官不好当了,庸官不好混了,恶官不好逞凶了”。

通过有力的反腐、改革,让“官不好当”,只不过是剔除那些笼罩在权力之上的特权弊病,压缩权力在法外的运行空间,将权力逼进笼子。而这,也是改革必须要清除的既得利益阻力的重要部分。

从另一角度来说,约束权力,加强权力监督,让权力不能肆意自肥寻租,其实也是对于权力自身的保护。在法治框架内运行和

履职的权力与官员,无疑会更倾向于以兢兢业业的履职去为民众服务,赢得民心,所谓“仕途”也自然更有保障。

随着对于权力约束的制度化监督逐步收紧,让官员感慨“官不好当”之余,它更大的目标应该是完成对社会权力观的改造。公务员也只是众多社会职业中的一部分,只因为它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天然要受到更多的社会监督。不管是官员还是社会,都要习惯“官不好当”这一基本趋势。

(朱昌俊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本报有删节)



「膜」名其妙

汽车太阳膜市场鱼龙混杂,十元的白膜喷点添加剂也成太阳膜,卖三十元。由于鉴别有难度,又没有全国性强制标准,难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天呈画

话说冲击世界一流大学之“冲击力”

姚荣栓

自由谭

去年岁末,韩正书记与上海市属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座谈交流,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命题:“上海需要能够冲击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需要专业鲜明的大学去冲击一流,还需要各类工程技术和高职高专在服务地方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争创一流。”

巧的是当晚从中央电视台二台见到了来京参加论坛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他可算是在全球第一个主张由政府主导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导人。上世纪末发达国家到了“后工业时代”,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国忽然惊醒,由布氏掌控的工党政府着

力发展“创意产业”,以这种高于传统产业24倍速度的新兴产业,辞工业社会之旧,迎创意社会之新。

布莱尔曾委托肯·罗宾森(Ken Robinson)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来研讨出一套开发创意教育的“策略”。罗宾森对英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研。他认为,欧美教育是为工业革命之后的劳力需求而设计的,不只是为了符合工业社会的利益,也是根据对工业社会的结构及文化两者的想象。学校仿照工厂流水线的原则来运作,基本管理原则可概括为“两化”——标准化、一致化,用的是统一教材、划一评量标准,如此“制造”出来的“标准件”般的人才,只能适应工业社会需求。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开始,互联网把偌大地球“网成为村”,知识经济、创意产业扑面而来,不论东西西域,都在一同呼唤创新创意的“非标人才”辈出。罗宾森撰了本《让创意自由》,提出一个发人深省又极其矛盾之现实问题:扼杀“创意自由”的正是该让人获得自由创意的机构——学校!他向西方教育制度大声疾呼:“教育的改革,必须先要有改变的理论为基础。该理论必须奠基在学校本身的创新,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

韩正书记不是期望上海高校“要主动加强与文化企业的合作,推进本市文化事业和产业大发展”么?那么,上海高校能否主动合作和有能耐推进发展呢?换言之哪里去觅得“冲击力”?罗宾森对教育界人士倒真

诚忠告过——“透过”(through)创意去教学,与“为了”(for)创意去教育是有差别的,后者是协助促进他人的创意工作,要让人人知道自己有创意潜能,鼓励敢于冒险而无畏失败;确认人们的创意力,磨炼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力,帮其找到自身创意所长;让每个学生独立发展完成创意,使之自信、自立地自由发展,加深加广对主观与客观的双重认识,对一切新点子、新观念和新发明都抱持开放态度,且和谐与他人互动。书中自有哲理,叫做“教育与训练是开启未来的钥匙”。不过,千万不能忘记,这把钥匙可以正反两面转,如果让钥匙顺转向“创意自由”,会觅着了“正冲击力”;反之把钥匙逆转向“扼杀创意”,则会错获“负冲击力”。